

清代满洲族源谱系与满洲姓氏源流研究的历史语言学方法*

金标**

摘要：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满洲”部族之族源谱系问题一直莫衷一是、不甚了了。中国东北古代各族群之族称、国称与其氏族名、部族名、姓氏及所处地域之名间存在着较为复杂而密切的联系。这就为利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厘清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提出以满语为基础语言，以历史比较法与内部构拟法为主要方法，对“汉字注音材料”“满语词族材料”“满文姓氏材料”三类材料分别采取S-理想模型、词族化、名号簇处理，从存世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对满洲族源谱系与满洲姓氏源流进行探索，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有益信息。

关键词：满洲；女真；姓氏；谱系；历史语言学

明朝末叶，“满洲”部族兴起于中国东北地区，最终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对于该族群的族源谱系问题，前人做过较多讨论，但莫衷一是、不甚了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成书的《钦定满洲源流考》^①，参考中国历代史籍，将东北长白山、黑龙江地域历史上存在过的各族群，全部纳入满洲源流之中。由于中原古代汉文史籍对东北族群的记载既不系统也不详细，且因朝代更迭、信息阻隔、中央与地方利益诉求迥异，因此造成记录错误和族称乱相附会现象频现。在古代中原价值系统中，特别是在“华夷”思想的作用下，人们更重视以衣冠服饰、有无文字、文字类别以及生产方式等对族群进行分类，而常常忽视语言类别在族群分类、源流考察中的价

*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国内外满族民间家谱总目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9VJX026）阶段性成果。

** 金标，男，满族，吉林省永吉县人，任职于通化师范学院长白山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古代民族史、清史、满族史、满语文。

①（清）阿桂：《钦定满洲源流考》，孙文良、陆玉华点校，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值。而乾隆帝建构满洲族源谱系的目的，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因无科学的史学方法与语言学方法，纵使修书者是彼时大儒，其在《钦定满洲源流考》中所建构之满洲族源谱系存在错谬之处在所难免。个别错谬甚至一直影响着当代学术界的认知和历史叙述。本文通过考察史籍认为，东北古代各族群之族称、国称与其氏族名、部族名、姓氏及所处地域之名间存在着较为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在具体操作上，满洲族源谱系问题与满洲姓氏源流的研究应该合并考察。

通过对语言的研究，一定能够找到对历史研究有价值的佐证资料和研究线索，这是中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如著名德国语言学家雅布克·格里姆（Jacob Grimm）在《德语史》一书中称：“有一种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①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L.R.Palmer）认为：“语言史与文化史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互相提供证据和解释。”^②王力先生在《新训诂学》一文中指出：“一切的语言史都可被认为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语义的历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化，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③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希腊人的种族起源是一个技术难度大且极具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问题。正是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对该问题的研究发挥了实质性的奠基作用。^④可以说语言是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钥匙，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历史语言学在清史、满族史和东北地方史研究中的价值。

一、历史比较法与内部构拟法

历史语言学兴起于19世纪初，其兴起使语言学研究具有了现代科学的意义。由于历史语言学中最常用、最重要的方法是“比较法”，因此这门学科又叫“历史比较语言学”^⑤。历史语言学是关于语言演变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语言学^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立论依据有二，一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二是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前者属于语言学理论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中西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它对语言和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音义关系、“名”“实”关系做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语言符号体系把两种非语言的因素，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和声音物质按社会约定俗成的传统联系起来，成为交际

① 吴安琪：《历史语言学》，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② 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38页，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③ 王力：《新训诂学》，见《王力文集（第十九卷）》，18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④ 参见徐晓旭：《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与希腊人种族起源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19（1）。

⑤ 朱晓农、寸熙：《拉斯著〈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演变〉述评》，载《语言科学》，2007（5）。

⑥ 吴安琪：《关于历史语言学的几个问题》，载《民族语文》，1998（4）。

信息系统。从语言内部构成的本质特征来看，语言是一个语言社会中的成员，用来进行交际、交流思想的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或交换信息的语音符号体系。因为语言符号有任意性，即语言社会约定俗成的特征，不同的语言必然有不同的符号体系。如果在相关的语言体系中出现若干相似的或平行对应的现象，自然会引出这些语言间的相似或平行之处是如何产生的问题。^① 经由以上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关背景的回溯，引出了我们对于“满洲族源谱系与满洲姓氏源流研究”的一些思考：“满洲”这一族称以及其统辖的满语姓氏，与“女真”“靺鞨”相关的那些族群泛称、部族名称、姓氏以及地名，乃至中国历代史籍中记录的那些“白山黑水地带”的古代国家、古代族群、氏族名称以及地名之间存在的语音对应或者语音相似性，是单纯的偶然？抑或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语言文化交流融合中的互相借用？又或是基于同民族语言在发生学上的同源性的反映？如果试图去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局限性的问题，那就是“白山黑水地带”的古代族群在满文创制之前，他们或是文字使用历史短暂，留存资料稀少且不成系统（如女真文），或是文字材料几乎完全没有留存下来（如渤海人），或是完全使用汉字（如渤海人），或根本就没有文字。总而言之，他们的语言得不到系统记录，而周边有文字的民族对他们的语言的记录也只是只言片语。这就给上述古代族群的语言与满语的比较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局限。为了尽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有赖于对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比较研究的深入，对满-通古斯“原始共同语”的构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满-通古斯语族诸语言与周边的蒙古语族语言、古亚细亚语族语言以及源于三韩语言的朝鲜语等诸种地理上邻近的语言的比较研究。但是这些都是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短时间内难有显著进展。

索绪尔是19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结构主义学者，他认为每一种语言在整体上都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在系统内部每一个细节都是相互关联的，^② 历时的研究是在考虑语言系统、系统的稳定和系统的重建等情况下进行。^③ 在结构主义的理论支撑下，绕过历史比较法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亲属语言间进行比较的要求，而在单一语言系统内部进行考察，从语言本身共时的语音聚合分布特点出发，根据语音结构的空格、异常分布和组合中不规则的形态交替，构拟原始的系统或较早时期的特点，^④ 这就是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

① 参见李振麟：《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载《语言研究》，1983（1）。

② 梅耶评论道：“从此以后，无论在哪个问题上都不容许忽视这样一个原理：每一个语言都构成一种系统，其中一切成分都互相关联着，而且都从属于一个非常严格的总纲。”参见A.B. 捷斯尼切卡娅：《印欧语亲属关系研究中的问题》，104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③ 结构主义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变化往往以系统、系统的稳定和系统的重建等等为目标。所以历时的研究不独不排斥系统和功能的观点，而是恰好相反，不考虑到这些观点就是不完备的。”详见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17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④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2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的内部构拟法 (internal reconstruction)。梅祖麟先生在《内部构拟汉语三例》一文中对内部构拟在资料方面设置了两个限制：第一，只限于一种语言，不涉及其他亲属语。第二，这种语言也只是限于某个阶段的共时资料，这个阶段可古可今，但是不能用两个或两个以上阶段的资料作为推论的出发点。^① 基于以上结构主义的内部拟测法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就目前来讲满语处于濒危状态，但是清代的满语文，特别是自康熙时期为规范满语文而编订《御制清文鉴》(收录满语词条约 12110 条)，至乾隆年间《御制增订清文鉴》(增补新定词汇 4700 多条，古代非常用词汇 1600 多条，合计约 18410 条)的成书，^② 也就是康雍乾时期的满语文文献，从语音、词汇到语法，都可以看作一个共时的具有完整语言系统的语音资料集，并且以十二字头为基础的，规范化满语文教学有清以来一直在满族人中代代传承。亦即无论是满文单词读音的音值，还是对于上述满文文献资料的语音都可以进行最大限度的接近和还原。因此可以在清代满语文的基础上，通过内部构拟法对满语的原始词汇、语素进行探索，以此作为满洲族源谱系和满洲姓氏源流研究的一个参考基础。

二、对三种语音材料的处理、研究与应用

针对于满洲族源谱系的建构与满洲姓氏源流研究这一课题，本文认为在历史语言学方法的角度上，我们应该重视汉字记音材料、满语词族材料、满文姓氏材料三个方面的语音材料的处理、研究与应用。

(一) 汉字记音名号材料及其 S-理想模型处理

对 16 世纪以前的中国东北地区各族系语言的记录，主要集中在中、日、朝(韩)的汉文史籍、文人笔记、碑铭石刻中，且绝大多数为汉字记音材料。在这些汉字记音的非汉语词汇类别中，我们重点关注但不限于以下类别：古代国名，如橐离、肃慎、夫余、句骊(高句丽)、渤海等；族群名称，如秽貊、沃沮、挹娄、靺鞨、女真等；部族名称，如粟末、按出虎、胡里改、完颜等；姓氏，如《金史·国语解》姓氏篇载女真三十一姓^③、《三朝北盟汇编·女真史》谓唐末女真“通用三十姓”^④、朝鲜《高丽史》载“东女真三十姓部落”^⑤等。此外还有氏族名称、地名、人名等也是我们关注的重

① 参见梅祖麟：《内部构拟汉语三例》，载《中国语文》，1988(3)。

② 参见李雄飞：《〈御制增订清文鉴〉刻本初探》，载《满语研究》，2013(1)。

③ (元)脱脱等：《金史·国语解·姓氏》，289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④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1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⑤ 董万仑：《辽代长白山女真“三十姓”部落联盟研究》，载《北方文物》，1999(2)。

点。以下将此类材料简称为“汉字注音名号材料”。

处理上述汉字注音材料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两点：

一是人类语言的语音是持续变化的。按照历史语音学的理论，这种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由于汉语的历时性语音变化，汉字的读音也是在变化的，并且汉语的方言差别有时也会影响到记音人的汉字选择，^①但是共时差别所体现的也是历时性的变化。

二是这些汉字注音材料所记录的语言，可能是同种语言，也可能是不同种语言。同种语言也存在共时与历时的差别。

由此可见问题的复杂性，但得益于汉语历时研究长期的积累，我们依旧可以从这些材料中获取具有相当准确度的、有价值的信息。借助汉语音韵学已有研究成果，构拟出这些汉字注音的氏族名称、部族名称、族群名称、古代国名、姓氏、地名的大致语音面貌，并依时间先后列出词汇表进而加以分析。

将汉字注音名号材料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建起网络结构加以研究。氏族名称可以发展为姓氏，氏族名称亦可以发展为部族名称；部族名称是国名、族群名称的一个重要来源，国名、族群名称也是姓氏的一个来源；地名与部落名称、国名、姓氏之间，也存在相似的转化关系。

如《渤海国志长篇》载：渤海遗裔有以渤海为姓者；《宋史·艺文志·别史类》载：有渤海填《唐广德神异录》四十五卷；又《宋史·女真传》：开宝五年夏，首领渤海那三人入贡；《辽史·高丽传（王氏高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高丽（王氏高丽）礼部郎中渤海陀失来降。^②“盖渤海亡后，其遗裔散之四方，或入高丽（王氏高丽），故冠渤海二字以别之。其后，遂以为姓。”^③又《周书·百济传》载：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余之别种。王姓夫余氏。^④可知因其王族源自夫余，故以部族名或国名为姓氏。

这一转化关系使得在族称、国称、氏族名、部族名、姓氏及所处地域名称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动态转换的网络。其中姓氏与地名这两个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使得该网络也具有了相当的稳定性。这一既动态转换又相对稳定的网络为我们深入讨论族源谱系提供了新的可能。

为了说明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动态转化的网络，我们将构建一个模型，本文将该模

① 如聂鸿音先生就是利用音韵学和汉语方言学方法对“女真”一词的语音给予了非常合理的解释。参见聂鸿音：《“女真”译音考》，载《宁夏社会科学》，2011（5）。

② 参见唐晏、黄维翰、金毓黻：《渤海国志三种·渤海国志长篇》卷十九《丛考》，66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③ 唐晏、黄维翰、金毓黻：《渤海国志三种·渤海国志长篇》卷十九《丛考》，66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④ 参见（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九《百济传》，8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

型命名为 S- 理想化模型，其基本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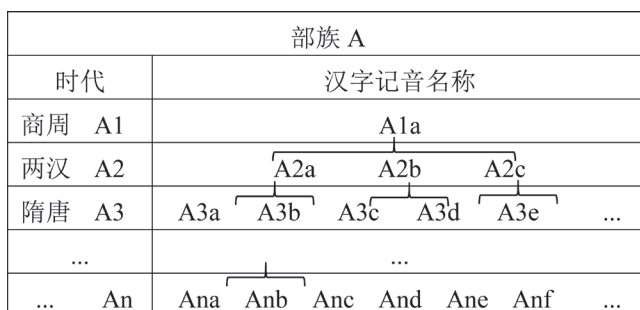


图 1 S- 理想化模型

模型中 A 为部落自称，阿拉伯数字为时代先后标记，小写拉丁字母为同一时代不同汉字记音词标记。例如 A3e，即 A 部落在第三个时代的第 e 种名号。这一所谓名号可能是族称、国称、氏族名、部落名、姓氏及所处地域之名，也有可能同时是其中两种或以上的所指。

这一理想化模型意在说明某 A 部落，在第 n 代有若干种汉字记音名号，这些名号在共时平面上所指或不同，但其都来第 n-1 代的若干种汉字记音名号的历时分化；第 n 代的任何一种汉字记音名号都存在进一步历时地分化成为第 n+1 代的若干种汉字记音名号的可能。至于第 n 代的某一种具体汉字记音名号会历时地分化为第 n+1 代的一种或多种汉字记音名号，抑或消失都是可能的。但任意第 n 代的若干种名号的所指，均与该 n 时代的 A 部落或其子遗直接相关。我们认定该理想化模型内的所有 Ann 名号都是同源的。

那么，对于以上同源的汉字记音名号，同为第 n 代内的不同名号可能仅仅是所用记音的汉字的不同，导致前述构拟的语音有所差别，会让不熟悉该地区历史、族群背景的人摸不清头绪，进而或者误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或者将它们与不相关的汉字记音名号乱相比附。而以汉语音韵学、历史语言学为工具，结合满语、东北史，就可以以语音变化规律为主线，将上述汉字记音名号中相关名号，按照语音关系排列成一个语音关联网或语音谱系树，这便是一个基础网络。将若干个构建出的基础网络，以历史、考古等材料为依托相互连接为一个更大的网络，并以此作为一种基础材料。为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打下基础，对满洲族源谱系的建构与满洲姓氏源流研究是大有助益的。

（二）满语材料的词族化处理

要解决满洲族源谱系及其姓氏源流问题，离开满语文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满语材料——主要是清代辞书——的利用方式决定了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仅仅依靠查询双语词典，检索词汇的共时语义来进行研究是对这部分材料的浪费。因此我们提出以“词族化（gargata gisun be mukvlara）”方式加以处理，可以使这类材料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有益信息。

对于“词族”的定义各家有所差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汉语词族》一文中提出了“词族（word family）”这一概念，即指汉语内部，某一词根、语素、音素以及由这一词根、语素、音素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来的所有词的总和。徐通锵先生认为，同族词是一个语言内部的构词法问题，主要是根据语音交替的方式去追溯某一族词的形成过程及其所从出的原始形式。先建立词族，后进行比较，是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不同于印欧语的一个重要特点。^①董为光等在《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一文中认为词族的比较研究有三个好处：一是能选择可靠的、来源最早的比较材料；二是可以在语音、语义方面“进行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复原”；三是可以排除借词的干扰。^②笔者在充分认识满语特征基础上提出：引入词族概念，将满语词汇词族化，再进行比较研究。这一方法可以成为我们打开满洲族称源流历史、语义及姓氏起源问题的一把钥匙。未来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或亦可发挥作用。

对于汉藏系语言比较研究，严学窘在《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一文中，根据“语音相似”“词义相通”“形态相符”三条原则来寻找侗台、苗瑶和汉语的同源词。^③而我们根据满—通古斯语族的特点，提出了构建满语词族的原则。

原则一，语义相关。梅耶在论述历史比较法的证明时指出，除了语音规则上的对应以外，意义方面的相符也应当同语音上的相符同样精密。^④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没有语义相似予以支撑的情况下，仅依靠语音对应建立的词汇关联是不充分的。例如，katu-n（强壮的、硬朗的）：katu-ri（螃蟹），它们不但语音相关，而且语义上的关联使它们的同词族关系更为紧密。

① 参见徐通锵：《历史语言学》，68—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② 参见董为光、曹广衡、严学窘：《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刊在日本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March, 1984, pp.105-121。

③ 参见严学窘：《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见《江汉语言学刊》第一辑第4页。转引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④ 参见[法]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38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原则二，词根稳定。作为一种无前缀、中缀，只有后缀的黏着语，满语主要通过词根或者词干上不断地添加构词、构型后缀来实现派生。因此，一个满语单词中越靠前的音节越原始，越靠后的音节产生的越晚近，进而我们可以推断其词干的稳定性，从前到后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其词根在可考察的范围内是相对稳定的。基于此，在满语词族的建立中，越靠前的音节、音素的对应性和相关性越强，参考意义也越大。

在考虑词根问题时，应着重考虑满语中语素结合的规律。这包含着许多具体的部分。比如满语是以后缀为主要词缀类型的黏着语，因此每一个单词的词根一直位于单词的前部音节中。再者比如要充分利用满语各词缀与词根结合时的规则，许多规则依托于对其相关词族的观察和分析，如语义功能上与词缀 *-la* 相似的 *-na* 是规律性地出现在辅音 *ng* 之后的，因此可以分析出词缀 *-na* 是 *-la* 在辅音 *ng* 之后的异语素，进而可以利用这一规则对其他的单词进行分析，完善满语的词族构建。

原则三，语音对应。通过元音、辅音的交替构造新词是满语常见的构词形式，因此，存在元音、辅音交替关系，且其语义相关、相近乃至相同的词对儿、词群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元音交替是满语的一种重要构词方法，即通过把一个词语的全部或部分元音替换为其他元音，派生新词的方法。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可将元音交替构词分为不同类型，而语音对称、语义相关是元音交替构词的显著特点。^① 如 *haha* (男人)^②；*hehe* (女人)；*ama* (父亲)；*eme* (母亲)；*amila* (雄)；*emile* (雌)；等等。

掌握音系的历时变化对词族的构建至关重要，满语中部分单词词首 *s*，对应鄂温克语以及蒙古语当中的辅音 *t*，这种辅音 *s* 和 *t* 的历时变化反映在了满语的内部，因此可以看到许多词首 *si* 和 *qi* (*qi* 源自于 *ti* 当中 *t* 的颞化) 的对应，比如 *qihin* (廐)；*sihin* (房檐)；*qilimbi* (抽泣)；*sirimbi* (擤鼻涕)；*qilba* (同名)；*silba* (同名)；*qi* (缝隙)；*si* (缝隙)；*seferembi* (揪)；*xoforombi* (抓)；*soforombi* (掬)；等等。

si be inu qi seme gisurembi.^③ (把“*si*”也称作“*qi*”)说明古人也认识到这种对应关系，但尚无法予以解释。这也是 *s*：*q* 在词首对应的一个不错的例子。

因元音交替、语流音变、历时性音变、元音逆同化、元音顺同化、方言差别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满语元音的变化相对较快、较复杂。因此，在词族构建中，应将辅音的相关性和对应性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

① 参见长山、季永海：《满语元音交替构词法》，载《民族语文》，2017(4)。

② 本文涉及的满语词汇主要参考自胡增益先生主编的《新满汉大词典》，并且多数词与《御制增订清文鉴》进行了互相参照。参见胡增益：《新满汉大词典》，135页、672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清)高宗弘历敕撰：《御制增订清文鉴》(殿刻本，1771)，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③ (清)高宗弘历敕撰：《御制增订清文鉴》(殿刻本，1771)，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三）满洲姓氏材料及其名号簇处理

“满洲姓氏材料”专指《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皇朝通志·氏族略》(以下简称《氏族略》)、《钦定八旗氏族通谱辑要》(以下简称《辑要》)、《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以下简称《氏族志》),合称“谱略要志”。

《通谱》^①为乾隆初敕纂,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校刊,是一部满洲姓氏全录。若将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佟佳觉罗(又作通颜觉罗),及附载于卷十八《雅尔湖地方通颜觉罗氏》之后的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四姓算作同姓,则《通谱》上篇共载满洲姓氏638个。

《皇朝通志》,又称《清朝通志》,修竣于乾隆五十一二年间(1786—1787),首列《氏族略》十卷,在《通谱》基础上增补满洲姓氏33姓,其中卷一首列“国姓爱新觉罗”,共计收录满洲姓氏678姓。^②

《谱略要志》是前后相沿、补充、修订、择要的关系,因此本文重点关注《通谱》之满文本^③。其所载满洲姓氏的满文拼写,与《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书于同一时代,属于共时的同一语言系统的语音资料。因此,可成为比较、构拟的基础材料。

对于满洲姓氏材料,我们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三个。

一是合宗并派。所谓合宗并派就是将有一个氏族不断分化而成的若干姓氏合并到一起来考虑。人口增长、地理环境局限、社会管理需要、迁徙、战乱等因素促使氏族、部落不断分化。即由一个氏族分化出两个氏族,并进一步分化出多个氏族,由一个部落分化出两个部落,并进一步分化出多个部落。这些分化出的氏族、部落,最初或许会继承原氏族、部落的名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语音的历时变化,及其在共时层面的反映(即方言),原本相同的氏族名称、部落名称、姓氏等也随之不同。这种分化导致出现了一个同源名号簇。对同源名号簇,必须要合并分析,不能孤立分析。

除去上述语音自然变化以外,伴随着氏族、部落的分化,人们会有意识地对其名称进行区分,我们推测这种有意识的区分主要是通过语音交替构词与后缀派生构词来实现的。语音交替构词主要是上文所述“元音交替构词”的方式来实现氏族、部族名称的区分;后缀派生构词是通过添加、改变族称后缀的方式来实现氏族、部族名称的区分。在实际操作上,我们将这类分化而成的名号也归为一个同源名号簇。

① (清)鄂尔泰等纂:《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乾隆武英殿本),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

② 徐凯:《满洲氏族、谱系文化与本部族认同初探(二)》,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③ (清)鄂尔泰等纂:《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文本,1744),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

姓氏的分化和区分则主要是通过“定中结构”进行区分，即在姓氏词的前面加上地名或者修饰性词语的方式进行区别，如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等诸觉罗氏，又如苏完-瓜尔佳、乌拉-瓜尔佳、叶赫-那拉氏、辉发-那拉氏等。对于此类定中结构名号，我们主要考察其“中”部，其“定”部留做他用。

二是远推根源。所谓远推根源，一方面在合宗并派的基础上，考察同一个名号簇内部的关系，反推构拟出其原始名号；另一方面通过语义将语音表面关系不明晰的名号联系起来，以一个构拟的原始名号为中心，构建一个名号簇。

试举例说明：

表 1 niuhe 名号簇

编号	姓氏满文	汉字记音	出处	关联
01	niuhe	钮赫氏	《通谱》卷五十八	*niuhe/niuxə/-
02	niuhere	钮赫勒氏	《通谱》卷四十六	
03	niuhuru	钮祜禄氏	《通谱》卷五	
04	iuhuru	佑祜鲁氏	《通谱》卷五十	
05	iuihuru	裕瑚鲁氏	《通谱》卷四十六	
06	niuhute	钮瑚特氏	《通谱》卷五十八	
07	*/niuyieilie/	女奚烈	《金史·金国语解》	

niuhe : niuhere 是附加词缀派生；niuhere : niuhuru 是元音交替；niuhuru : iuhuru 是首辅音脱落；iuihuru : iuhuru 是元音异化；niuhuru : niuhute 是附加词缀更替。该名号簇或自 niuhe (狼) 派生，或经 niuheri (狍) 派生而来。又，清代钮祜禄氏多改汉姓郎，盖因“狼”与“郎”字同音，是以为姓；《金史·金国语解》载女真姓氏“女奚烈曰郎”，可佐前证。因此将其构成一个名号簇。其词源是 *niuhe-，意为“狼”。

表 2 heje 名号簇

编号	姓氏满文	汉字记音	出处	关联
01	heje	赫哲氏	《通谱》卷六十五	heje-
02	eje	额哲氏	《通谱》卷六十二	
03	hejiri	赫济理氏	《通谱》卷五十八	
04	heqila	何齐拉氏	《通谱》卷六十二	
05	gejile	葛济勒氏	《通谱》卷四十五	
06	gejin	格晋氏	《通谱》卷六十	

h: g, i: e, r: l, -ø: -n, j: q, ø-: h-, 均为满语中交替构词的常见形式, 不再赘述。又 gejile (葛济勒氏) 今天仍是赫哲族大姓。因此推断该 heje 名号簇俱是彼时满族赫哲部, 以部族为姓氏, 又历代相沿分化而来, 到乾隆朝存六姓。

越是在历史上影响力大的族群或古国, 因其人口众多、文化影响力大, 历史传承相对稳定, 越易于在其融入的族群的语言和姓氏上留下印记。东北亚地区存在过的古代氏族、国家、姓氏, 或外来族群, 每当有人口参与到明代女真族群的形成中, 就有可能在满族中留下与其相应的姓氏。如下表中 03 至 08、09、10 所示。

表 3 与族称、地名有关的满洲姓氏示例

编号	姓氏满文	汉字记音	出处	关联
01	keyen	克音	《通谱》卷五十五	以地为姓氏。“开元”原为东夏国都, 元代迁址至今辽宁开原 (keyen)
02	jusiri	朱锡理	《通谱》卷六十	以族称、部族称为姓氏 juxeri (朱舍里部)、juxen (女真)
03	monggolji	蒙古尔济	《通谱》卷五十一	以族称、部称为姓氏 -ji/-so/-qu/-ro/-zi 或为标人派生词缀, 或为复数标记。加于 monggo (蒙古) 上派生或直用为姓氏 或为元明时蒙古人融入女真的过程中形成的姓氏
04	monggoso	蒙鄂索	《通谱》卷五十七	以族称、部落名称为姓氏 -ji/-so/-qu/-ro/-zi 或为标人派生词缀, 或为复数标记。加于 monggo (蒙古) 上派生或直用为姓氏 或为元明时蒙古人融入女真的过程中形成的姓氏
05	monggoqu	蒙古楚	《通谱》卷五十七	
06	monggoro	蒙鄂络	《通谱》卷五十八	
07	monggozi	蒙果资	《通谱》卷六十二	
08	monggo	蒙果	《通谱》卷六十二	
09	heje	赫哲	《通谱》卷六十五	以族称、部族称为姓氏 与赫哲族称 (heje) 同 ^①
10	dahvri	达瑚理	《通谱》卷六十一	以族称、部族称为姓氏。 与达斡尔族称 (dahvr) 同

古代名号汉字记音材料、满语词族材料、满族姓氏材料, 可以作为满族族源谱系与满族姓氏源流研究的基础, 将三者进行互相对比, 再结合东北地域的历史脉络、部族和姓氏的地理分布、人口迁徙与变迁、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考古学相关成果等知识进行考察和探讨, 以使我们的研究和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三、辅助性方法

除上述三种材料及其处理使用方法外, 为了使本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可靠, 我

① 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 184页、185页, 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89。

们提出以下辅助性方法。

（一）把握本姓改“汉字姓”规则作为名号语义的重要抓手

满族语本姓改“汉字姓”是有其可探索的规律的，通过对其规律的把握，可以显著提高姓氏语义探索的成功率。

满族本姓改汉字姓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意译民族语本姓为汉语，并选用同义或同音、谐音汉字单字为姓。如，本姓“散答”“萨克达”，语义为“老”，遂以汉字“老”为姓，此外也会或因汉人无“老”姓，或因“老”字为姓不雅，遂取谐音“骆”“罗”“礼”为汉字姓。又如，本姓“女奚烈”“钮祜禄”，语义为“狼”，或因汉人无“狼”为姓氏，或因“狼”字为姓不雅，遂取同音“郎”字为姓。此外，如本姓“萨察”，意为“盔”，遂取谐音字“隗”为姓，本姓“宁古塔”，意为“六”，遂取谐音字“刘”为姓；本姓“乌雅”，意为“猪”，遂取同音字“朱”为姓。不胜枚举。

第二种，音译民族语本姓，并选取首音节同音、谐音汉字为姓。如，本姓“舒穆禄”“舒舒觉罗”，取首音节同音汉字“舒”为姓；本姓“富察”取首音节同音汉字“富”“付”“傅”为姓；本姓“董鄂”去首音节同音汉字“董”为姓。又如，本姓“瓜尔佳”，因首音节同音汉字“瓜”不美，随取首音节谐音汉字“关”为姓。^①皆属此类。

第三种，以某代祖先民族语名首音节同音、谐音汉字为姓。此类情况在清末民初较为典型，但与本文关系不大，兹列于此，不举详述。

三种改汉字姓的方式中，第一种，即按本姓语义改汉字姓是金代女真改汉字姓常见方式；第二种，即按本姓首音节改汉字姓是清代满族人改汉字姓常见方式。此种差异是因为随着历时的语音变化，距离姓氏产生的年代越久远，后世族人对本姓的本义的记忆越模糊。亦即，越早改汉字姓，其汉字姓与本姓本义的语义关系越密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本姓的语义，使其与满语一般词建立联系，进而将这部分名号专名纳入词族之中，可以推动对姓氏、部族、古代国家、古代族群之间的关系的探索。

（二）将同源词及词源研究作为名号研究的有益补充

同源词及词源研究应作为名号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源词与同族词不是一个概念，同族词是一个语言内部的构词法问题，而同源词则是根据语音对应规律去追溯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和发展规律。”^②针对本研究所涉及词汇，必须要区分其是满-通

① 参见刘小萌：《清代满人的姓与名》，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②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古斯语族内部产生的，还是从其他语言借入的。

“任何一种环境中的原始社会的居民对他们的环境以及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对象都有极细致的观察和用词上的分辨。人类早期社会使用的语言，更多的词语是直接围绕着他们的，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词汇，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抽象的概念用得越来越多。”^①因此，我们在认识夫余、秽貊、高句丽的语言以及靺鞨、女真、满-通古斯诸语的具体单词是自源还是借源时，需要考虑上述诸语使用者的生存环境及其历史时期。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古代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地域的自然环境、动植物品种、该地区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历时变化。

克劳森(J.Clauson)和A.罗纳-塔斯(Andres Rona-tas)针对如何判断阿尔泰语系诸语中的借词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②在实际操作中，长白山地域的古代族群，其语言中的借词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汉语，这是其与中原王朝的密切交流造成的；二是草原族群语言，这当然也是其与突厥、契丹、蒙古等族群的互动造成的。正如吴安琪《历史语言学》一书所说：“参照借方与贷方语音和形态的历史，同源词和借词是可以区分的。不同历史层次的借词在借方和贷方中的历史不一样，也可以区分的。同源词(或同源词根)与借词的区别除了可依据语言以外的情况判断外，主要依据词的语音和形态的历史追溯来判断。语言(甲)中的借词从借入那一刻开始就成为这种语言的词，按照这种语言的语音和形态的规定来表现。”“当借词在一种语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后，往往迫使原有的同义词扮演另一个角色，甚至不再担任任何角色而失去。”“如果不是尽量地把词的来历搞清楚，研究就会成为一团乱麻，所得出的结论也不能令人信服。”^③

(三) 识别后缀以推动名号簇的构建

满语名号经常是带有后缀的，这些后缀是一种区别标志，有时也带有语法意义。识别出这些后缀，不仅有利于我们判断一个名号是自源的还是他源的，也有利于我们构建起名号簇。他源名号总是会在进入满语时发生归化现象，如俄国学者史禄国在清末对满语群体的调查中，就记录到“事实上，满族人也说，他们普遍把汉族姓氏加上满语词缀(例如，后缀-ju)后运用”“满族人只需要多多少少把汉族家族姓氏‘满化’一下就可以为己所用了”。^④

① 吴安琪：《历史语言学》，8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② 参见王远新：《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20—2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③ 吴安琪：《历史语言学》，86—8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④ 参见[俄]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高丙中译，刘小萌校，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需要注意的是，名号后缀不是凭空产生，其来源绝大多数是和一般词汇后缀一致的，个别未在一般词汇后缀中出现的，大约也是消失在了历史中。为了让这种后缀识别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将前期研究成果中确认的与满洲族源谱系与满洲姓氏源流研究密切相关的后缀列于下，以供参考。

表 4 名号研究常见后缀

编号	后缀	功能	可能来源	例
01	-kA/gA/hA (A=a/e)	①区分同源名号 ②归化他源名号	①与满语 hala/ɣala/ (姓氏)密切相关 ②与汉字“家”相关	*wudika (<*/wut ^h i/<weji) 兀狄哈 ^①
02	-kiyA/-giyA/hiyA (A=a/e)		来自 01	daigiya (<*daika) 戴佳 tungguya (<*tungka) 佟佳 magiya (<*maka) 马佳 ^②
03	-lA/-rA (A=a/e/i/o/u/)		待考	niuhe 钮赫氏 >niuhe-re 钮赫勒氏
04	-du/-tu		待考	nam-tu 那木图氏 nam-du-lu 那木都鲁氏 *namtu 南突氏 ^③
05	-tA/-sA/-qA (A=a/e/o)		名词复数后缀	monggo-so 蒙鄂索 monggo-qu 蒙古楚

限于篇幅不能尽述，别文另详。

以上词缀的识别和判定，也与上文提到的满语词族的构建密切相关。满语的词缀识别还有较大的可以深化的空间，而且越是古老的词缀，其识别就越发困难，但也相应地对于我们的工作而言更加重要。

四、结束语

本文围绕满族族源谱系建构与满族姓氏源流研究，提出了以满语作为研究基础语

① 《金史》卷二十四志第五地理上载有“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其中有“兀的改”一称，亦被写作“乌底改”。刘肃勇：《金世宗对金源故地的经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1）。元代也有“兀的厄”“兀的哥”等称呼，参见杨茂盛：《关于元代兀者的名称、分布与族属问题》，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4）。朝鲜《李朝实录》中有多处关于女真部落“兀狄哈”的记载；现代俄罗斯境内有满-通古斯语部族“乌德盖”，又记音为“乌德赫”“乌迪赫”等。参见孙运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乌德盖人》，载《世界民族》，2002（1）。

② 《通谱》卷七马佳氏（magiya），卷十九、卷二十佟佳氏（tungguya），卷二十九戴佳氏（daigiya）。参见（清）鄂尔泰等纂：《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乾隆武英殿本），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

③ 《通谱》卷二十一那木都鲁氏（namdulu）、卷六十五有那木图氏（namtu）；朝鲜史料《龙飞御天歌》记“南突兀狄哈则速平江南突阿刺哈伯颜”，“南突”为一女真部族集团。参见董万伦：《〈龙飞御天歌〉记东女真姓氏及部族移动、合流研究》，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3）。

言，以历史语言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并明确了围绕该方法具有价值的相关语音材料及其处理使用方法。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试图将这些问题简单化的方式，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离问题的真相越来越远，因此本文提出并强调了三种语音材料的价值及利用方法，即汉字记音名号材料及其 S-理想模型处理、满语材料词族化处理以及满洲姓氏材料及其名号簇处理。多元的材料的存在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而对这些材料的充分利用必然更加有利于对族源谱系建构的研究。

三种语音材料的交集既是深入满语的历时研究，也将其与历史的研究充分结合。汉字音译材料和满洲姓氏材料，是脱离于语言自身的语言化石，而词族的构建，是存活于语言内部的语言化石，本文提出的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即是对这些化石资料的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以上材料列举了一些示例，在对一些示例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对汉字记音的灵活运用，对满语音系的历时研究，对满语构词法的研究，对满族、部落、氏族发展中规律的探索等，这些方法缺一不可。本文希望通过提出围绕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在满洲族源谱系与满族姓氏源流的研究中，挖掘出更大的空间，并呼吁围绕满语的历时研究能够日益深入、完善，与历史的研究相呼应，落实到更为科学的研究方向里。